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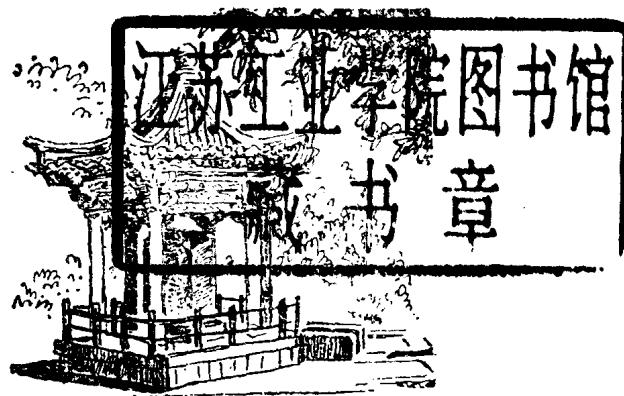
延邊歷史研究

第三輯

延邊歷史研究所編

延边历史研究

YANBIANLISHIYANJIU



延边历史研究所编

一九八八年三月·延吉

前　　言

《延边历史研究》第三期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期是在州委、州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延边国凤建材公司的赞助下出版的。

本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国朝鲜族的历史和延边地方史方面的论文、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史实争鸣、历史资料等文章。

延边历史悠久，若想把各族人民创造的历史调查清楚，整理明白，使它成为无愧于我国历史中的明珠亮玑，那还有待于史学界和广大史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延边历史研究》从1988年起改为季刊，并由衷地欢迎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由于编辑水平所限，难免鱼目混珠，玉中见瑕。敬望读者不吝批评斧正。

延边历史研究所
《延边历史研究》编辑部

一九八八年三月



目

来往于太行山根据地 文正一 (1)

吉林省学生工作团简记 金春明、

张德庆、关宝烈 (11)

大荒沟起义的回忆 蒋泽民 口述 (76)
鲁德山 整理

回忆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 涂锡道 (86)

强渡长江战役中的156师 崔明世 (127)

重返延边 董崇彬 (133)

《三·一三》延边青年学生的反日

示威运动 金东和 (138)

龙井大兴电灯公司兴衰始末 权德生 (150)

解放战争时期延边地区的剿匪

斗争 千寿山 (32)

略谈高句丽民族 沈克秋 (177)

略述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在延边

对日作战经过 安华春 (183)
田象程

珲春军工生产基地 张维权 (192)

汪清县游击队的建立发展及其反

日斗争 文虎甲 (202)

解放战争时期延边人民参军参战

概况 姚作起 (210)

苏联远东地区民族的风俗民情 海东 (117)

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总第三期)

录

史
实
探
微

人
物
春
秋

历
史
资
料

抗日时期的中共汪清县委 崔锦哲(219)
浅谈日本帝国主义对东满地区的移

民侵略政策 朴京才(228)
童子军 姜龙权(237)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东满根据地的
建设问题 安华春(59)
关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
独立师制建制考 李光仁(170)
谙议近代贸易重镇——珲春 黄今福(21)

和龙县游击队长——金世 李光仁(246)
亲日反共的崔允周 崔武益(251)

建国以来延边部分革命
文物资料 崔吉学(254)
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图们分馆 卜钟燮(265)
清末图们江水师营 田象程(270)
卢州之稻 杨再林(273)
解放战争时期延边的建军简况
..... 姚作起 高云凤(277)
延边近代大事记(1712—1911)
..... 韩俊光、高兴民、李钟官(291)

来往于太行山根据地

文正一

一九三一年，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九·一八”事变，借机向东三省发起猖狂进攻。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地沦陷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在此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之际，我早年就读的吉林省珲春县县立初级中学的部分进步师生，愤然离开家乡，奔往关里寻求革命之路。这时我家已由珲春迁居朝鲜。我在朝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春季，凑了一些路费，只身回到中国，前往关里寻找他们去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去向，只好冥中盲索地四处闯荡。我路经沈阳，来到了北平。当时的北平，乌云笼罩，一片萧条。我一天天毫无目标地东游西逛，可是连他们的影子都没看到。在北平我一无亲二无故，过着乞丐般的流浪生活。有一天我接到家乡亲友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吉林省龙井县恩真中学的一些进步师生到南京求学去了。我得到这一消息喜出望外，顿时感到浑身增添了力量。

一九三四年初，我辗转来到南京，终于找到了我寻找已久的同学们。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进入中央大学当了旁听

生。当时，金学武等好几名朝鲜族青年在这里学习。在中央陆军学校也有王子仁等好几名朝鲜族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中央陆军学校学习的这些朝鲜族青年，都是当时关内朝鲜族进步青年的秘密革命组织——“十月会”的成员。这年十月，我也加入了这一组织。

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十月会”的朝鲜族青年们一心想奔赴延安。可是几次想去，都未能去成。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之下，在汉口创建朝鲜义勇队。我们“十月会”的人，绝大部分参加了这一部队。朝鲜义勇队在国民党管辖区积极开展了反日宣传活动，特别是活跃在国民党第一战区（河南省洛阳地区）和第五战区（湖北省老河口地区）的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在火线直接向日寇进行喊话宣传；一方面深入到群众之中利用广播、小报、演讲、演剧等形式，积极开展反日宣传活动。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朝鲜义勇队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把朝鲜义勇队的各个支队陆续转移到解放区。当时我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里专门负责朝鲜义勇队的转移工作。从一九四〇年春到一九四一年秋，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先后分三次将朝鲜义勇队第一、二支队的大多数队员送往解放区，随后我带领部分同志也转移到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在转移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艰辛和波折。

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季，我正在秘密地进行着转移国民党

第一战区最后一批朝鲜义勇队的准备工作。有一天，洛阳国民党长官司令部的一个参谋来到我的宿舍告诉我说，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来通知，让我马上到那儿有要事相商。我得到这一通知后，立刻赶到了那里。办事处的负责同志递给了我一份电报。电报是由彭德怀副司令员打来的，让我们迅速转移到延安。我看完电报，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对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我想给你添点麻烦，劳驾你把我们的工作人員也一同带去。”当时朝鲜义勇队有几名同志外出还没回来，还有几名同志在病中，因而我感到有些为难，踌躇了一会儿，问他八路军工作人员有多少人？他说：“人数还不少呢，总共二十人。他们都是朱总司令到这儿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时候秘密带来的同志。从现在的形势看，他们要是继续留在这里，大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所以需要赶紧转移。”通往解放区的路我不熟悉，要是光我们朝鲜义勇队的人，因为人数少，行动方便，还有点把握。可是再增加这么多的人，将会在行动上带来很大的不便。但我又寻思既然情况这么紧迫，困难再大也得一同带去，于是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一看我答应了，高兴地说道：“没有来得及走的朝鲜义勇队同志由我们负责，请放心。看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让那些工作人员装扮成朝鲜义勇队，这样行动上更方便些。”他听了之后，认为是个好办法，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回到宿舍以后，我琢磨了好久，决定以视察黄河以北朝鲜义勇队工作情况的名义办理渡河证和通行证。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长官司令部参谋处。这天的值日官恰好是在一个院住了三年的熟人。他听了我的来意，没费什么

口舌，痛快地答应了。他问我一共去多少人？我说，具体的人数还没定，因为这次是到前线去视察，去的人要比往常多一些。他说：“那么，人数以后你自己填写吧。”他说着把两样证明递给了我。

当时正是月初，国民党第一战区所属部队都派人到洛阳领取薪金，我打算在他们之中物色一个人，以便一同渡过黄河。于是我向国民党长官司令部的王参谋说出了这一打算，他把我介绍给了驻守在河南林县一带的方炳勋部队的一个营长。林县位于河南省与山西省的交界附近，离太行山解放区不远，所以王参谋的这一安排正合我的心意。这天中午，我把那个营长请到饭馆招待了一顿。几盅酒落肚，他便有些兴奋，话也多起来了。趁此机会，我向他提出了我的请求。他听了我的话，爽快地应允道：“文先生替我们作宣传，这点事算什么？何况咱又是老乡（都是东北人）呢！”这时我故意装成还有些不大放心的样子说：“封锁线的那边不是不归你们管吗？”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咳，那些个伪军好对付。只要舍出点‘买路钱’就行。”我看他什么都说得很有把握，也就放心了。最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没有，他让我帮助他们办理通行证，再给他们解决几支手枪。我答应了他的这些要求，并很快地给他们解决了通行证和五支德国造手枪。

预定出发的那天下午六点钟，我带领朝鲜义勇队的四名同志来到了约定的地点——洛阳市郊的一个土地庙。到那儿一看，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工作人员还都没有来。我们十分焦急地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到了九点钟，他们才来

到。他们一共二十人，其中还有四名女同志，带队的同志叫郭大光。他们来了之后，我们便立即出发了。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朝鲜义勇队的同志们还教给八路军同志们几句简单的朝鲜话，文正元同志还教给了八路军的四名女同志一首朝鲜歌曲。之所以这样做，是让人们认为我们都是朝鲜义勇队的人。而那些女同志都是搞文艺宣传的演员。

第二天早晨，我们来到了跟那个营长约会的地点。而后跟那个营长和他所带领的士兵们一起继续向前赶路。我们顺利地渡过了黄河，通过了伪军驻守的封锁线，来到了国民党管辖区内的焦作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那个国民党营长和他带领的士兵们住进村内，我们住在紧靠这个村庄的另一个小村子里。我怕国民党当局对我们产生怀疑，跟郭大光同志商量之后，带领我的警卫员和一名工作人员，主动地前往县政府会见了国民党县长。国民党县长一看我的名片上写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字样，又听说我们是到前线去对日军进行政治宣传的，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早餐。吃罢早饭，他要去慰问我们的同志。我怕惹出麻烦，婉言谢绝了他的这一诚意。当我们向他告别，走出县政府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们好多牛肉罐头之类的食品。我们带着这些食品回到住处，同志们感到十分欢喜，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文队长，干脆让那位国民党县长给咱们当后勤处长吧！”听了这话，大家不禁哈哈笑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跟那个国民党营长告别，取道中条山，步入山西境内。到了晋城以后，又折向东北，经过壶关、平顺等地，来到了国民党区和解放区交界线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在

这里找了一位农民向导，并让我们一行中的孙超同志跟他一同到解放区去联系我们的越界问题。

第二天，那位向导带着孙超同志的一封信回来了。信中说，他们所经过的路上没有国民党军队，让我们见信后立即动身，过了界将会有人迎接。我们即将要动身的时候，忽然有一支国民党军队开进了村子。这一意想不到的情况使我感到有些惊慌。我跟郭大光同志商量了一下，还是采取了上次的办法，让大家回到原来的屋子装睡觉，只带我的警卫员前去会见国民党军队的头目。那个头目是一个团长，我向他编造了一通我们到这里来的原由。起初他对我有些怀疑，向我问起了洛阳国民党长官司令部的一些情况。他看我对他的情况对答如流，又听说我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便喜形于色地说道：“这一说，咱们还是同学呢！”说罢，把我们请进屋里，燉鸡焖肉地热情招待。酒过数巡之后，那个团长兴奋之余拿出一张军用地图看了看，略带惊讶地说道：“咳呀，老兄差点走入共产党的地界！我给你留下两个人，给你们当向导。”但我借故谢绝了。他看我一再谢让，索性把那张军用地图送给了我。这支国民党部队是到前线去换防的，不到晌午就开拔了。当我送别那个团长回到住处的时候，同志们正在焦躁不安地等着我。大家听了上述的一番经过，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们离开村子，随着那位农民向导翻过一座山，趟过一条小河，向另一座山上爬的时候，忽然从山顶上的一所小房子门口闪过两个人影。我立即派几个人前去追赶，那两个人开枪阻击，追赶的同志们随即予以还击。那两个家伙抵挡不

住，仓皇逃跑。我们的同志紧追不舍，终于捉到了一个。经审问，他们是国民党军队的便衣特务。不久，我们就在这座山顶上跟前来接应的八路军一个连相遇。我们步入渴望已久的解放区，跟日夜思念的亲人们拥抱在一起，一个个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我的警卫员看到这一情景，感到十分惊诧，因为到这时他才知道我原来是个共产党八路军。后来他在八路军同志们的启发教育之下，很快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入了革命队伍，以后又被送到抗大分校学习。

我们朝鲜义勇队的几名同志到达解放区以后，在八路军同志的帮助下，没过几天，终于胜利地到达了朝鲜义勇队总部所在地——桐峪。

我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以后，主要从事两样工作：一是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另一个是深入到敌占区动员朝鲜青年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朝鲜义勇军。

我受朝鲜义勇队总部的派遣，到八路军豫北办事处（河南省林县任村）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听说朝鲜义勇队一名队员的哥哥在彰德日本宪兵队当翻译。听到这一消息以后，我便打扮成商人前去会见了那个翻译。以后经过多次接触，我看到他还有民族精神和爱国心，于是干脆说出我的身份，对他反复进行了革命宣传。在我的启发引导之下，他终于弃暗投明，并且交给了我一份宪兵队特务的名单和照片。这样一来，彰德地区的日本特务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后来，我被调到朝鲜人聚居的河南省新乡，专门从事对朝鲜青年的抗日宣传工作。

有一天，从我住的旅馆一个房间里传出来朝鲜人嘈杂的

说话声。我有些好奇地走进了那个房间，原来是一伙朝鲜青年正在要钱。为了了解他们的身份，我也索性坐下来参加了他们的赌博。我一边陪他们赌钱，一边对他们观察摸底，物色了其中姓池的一个青年。赌博散场以后，我把他领到了饭馆。酒桌上，他向我讲述了他流落到新乡的缘由。他是个很有爱国心的青年，为了施展救国救民的抱负，他离开家乡，随同曾经参加过朝鲜独立军①的哥哥一起去投奔光复军②，可是在途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蹲了四十天监狱。出狱以后，他们哥俩又曾寻找过光复军，可是连个光复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于是，他们只好放弃投军的念头，各谋各的生计。他在新乡落脚，做些零活糊口度日。他的哥哥和姐姐则在北京当临时工人。这天晚上我到他家住了一宿，以后又来往多次。在多次的接触中，我看他憨厚诚实，觉得可以信赖。有一次我问他有什么专长，希望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在学生时期摆弄过照相机，想开一个照相馆，可是没有资金。我跟他说，资金由我解决，两个人合伙办一个照相馆。听了这话，他喜出望外，欣然表示同意。但后来因他跟我前往太行山根据地，这个计划未能实现。

几天之后，我和他一起到北京找到了他哥哥。临走之前给他家留下了一笔钱，让他们添补生活。他哥哥叫池龙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他身材魁梧，性情豪爽，一见面就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以后经过几天的交往，我们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当我问及他参加朝鲜独立军和寻找光复军的那段往事的时候，他慨然叹道：“咳！身为男子汉，空有救国之志啊！”我看他还有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便向他表明了我的身

份，并劝导他奔赴太行山，参加朝鲜义勇队。听了我的话，他一把抓住我的双手，无限欣喜地说道：“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天总算找到我日夜盼望的人啦！”这时我也有些激动，一边摇摆着他的双手鼓励他投身革命的宏图大志，一边尽我的能力给他讲述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

几天之后，我领着池龙成他们兄弟两人来到了彰德。为了便于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我让他们俩改换成了汉族打扮。这天晚上，在我们住的旅店房间里，又住进了一个名叫韩春善的朝鲜青年。他的穿戴很破，言谈举止有些拘谨，但是待人很有礼貌。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他家住在北满，听人们说到关里倒卖大烟能挣钱，便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他虽然穿得很破，长相却很精灵，所以我有心把他也一同带到解放区去。于是当他问到我的情况的时候，我便顺水推舟地回答他说：“我们也是倒卖大烟的。”他听了我的话，高兴地说：“大哥，你把我也收下吧。你让我干啥我干啥。”我回答他：“你可知道，干我们这行是有生命危险的啊！”他说：“我不怕，人活在世上反正免不了一死。”我看他意志挺坚决，就把他收进了我们这个“大烟贩子”的行列。

在一个跟八路军有联系的伪军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了离彰德约有七、八十里的凉山游击区。当我们翻山越岭地在林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韩春善的神色有些惊恐不安。他扯了扯我的衣角说：“大哥，咱们这是往哪儿走啊，要是遇到土匪怎么办？”我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对他说：“我是干这个的，不怕土匪。”他看着我伸出的两个手指，更感到疑惑不解。我只好直截了当地说明我是跟八

路军同伙，我们现在是奔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一路上，我向他耐心地讲解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到了太行山根据地以后，经过“五月扫荡”，他对日本鬼子的野蛮行径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以后又到抗日军政学校学习，他的革命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他和池龙成兄弟俩后来都磨炼成了优秀的朝鲜义勇军战士。

我到太行山根据地不久，组织上又把我派到晋西北，从事对前往延安的朝鲜人的审查和安排工作。在这期间，我仍然出入于敌占区，物色进步的朝鲜青年，把他们送往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每去执行一次任务，虽然都要经受很大的风险，但每每胜利完成任务之后，都感受到了无限的欣慰。

注：

- ① 一九一〇年日本帝国主义吞併朝鲜以后，朝鲜国内的义兵被迫转移到我国东北进行抗日活动的武装队伍。
- ② 二十至三十年代，驻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组建的武装队伍。

(千寿山整理)



吉林省学生工作团简记

金春明 张德庆 关宝烈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吉林省学生工作团(简称学工团)，1947年5月成立于当时吉林省府所在地延吉市的省立延吉第一中学。

延吉一中是1946年由延边公立两级中学和女中合并成立的。在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下，由抗日老干部魏东明校长主持校政。他经常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致使全校师生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逐步消除了盲目的正统观念和对共产党的疑虑。

1947年4月，东北民族青年联盟(简称民青)从哈尔滨总部派人到延吉开展工作，以延吉一中为重点建立民青组织，第一批民青盟员举行了入盟宣誓。由魏东明校长主持，特请吉林省委秘书长袁任远同志作监誓人。宣誓仪式既庄严又热烈，师生政治觉悟的提高和民青组织的建立为组成学工团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为了适应1947年春夏东北解放区形势日益发展的需要，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在参加实际革命斗争，接触工、农、兵，

深入社会活动，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工作，坚定青年学生的革命信念，当时任吉林省教育厅督学的梁再同志提议，经上级批准，决定组建学工团开赴到新解放区桦甸、盘石、双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反奸清算斗争，慰问前方作战人员和伤病员。经过号召动员，延吉一中高一和初三等高年级学生踊跃报名，很快组成一支六、七十人的队伍。这些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大部分人都是一次离家，较小的学生睡觉时还依偎着母亲呢。当时前方的战火很激烈，条件很艰苦，不少家长对孩子报名去前方工作有些担心，有的甚至泼冷水扯孩子的后腿不让去。但由于这些学生政治上进步，思想坚定，最后家长也只好允许参加了。在这方面民青盟员起了带头和推动作用，民青干部陈述增等成为这支队伍的骨干。由抗日老干部梁再同志任团长的吉林省学工团，经过短时间的集训（政治教育和排练节目）后，就于当年6月19日出发了。行装很简单，除了每人的小背包，简单的演出用道具外，只有几只老式步枪（康九三类）和少量手榴弹。没有发统一服装，只是每人的左臂上佩戴一个菱形的臂章。

从延吉坐火车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敦化。虽然只停留几天，却吸收了当地中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数人，为学工团增加了新鲜血液。第二站是蛟河，因当时的火车只通到苇塘车站，下车后步行到蛟河一中。还没有来得及放下背包，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临蛟河上空，进行空袭。机上射下的炮火顿时增添了战争的气氛，但学生们井然有序地进入了防空壕隐蔽。开始时有的情绪紧张，后来也就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了，整个士气没有因此而受到波动。经蛟河中学校长、抗日老干部